

真抓实干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报,对2020年落实稳就业保民生、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16个地方予以督查激励。在“十四五”开局起步之际,通过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地方予以表扬和激励,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各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当其时、大有必要。

健全正向激励机制,是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从这次通报表扬情况来看,216个受激励地方典型性、示范性较强,兼顾了东、中、西部地区平衡,体现了向基层倾斜的原则;设置的30组激励类别突出重点、导向鲜明,涵盖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任务、重大政策举措;相应采取的30项奖励支

持措施涉及资金、项目、土地、改革先行先试等方面,并明确了组织实施单位,可谓实实在在的政策“大礼包”。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才能干出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干出人民群众的幸福。2020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中乘风破浪,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各级狠抓落实、苦干实干。对各级政府而言,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是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还是落到行动中?是浅尝辄止,还是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这些都检验着工作作风和责任担当。这次受到通报表扬的地方,是真抓实干的典型,也是我国改革发展稳步前行的有力缩影,是各地区各部门学习的榜样。

真抓实干,贵在一个“真”字,关键在一个“实”字。从这次受表扬的情况来看,既有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也有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的,事实证明,不论哪个地方、不论哪个领域,只要保持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就能把工作干好、干出经得起检验的成绩来。各级既要保持抓落实的定力,对中央明确的目标任务、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也要掌握抓落实的方式方法,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如何才能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立足新发展阶段,如何才能稳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如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关键就在于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央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把既定的发展目标落到实处。受到督查激励的地方要充分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再接再厉,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其他地方更要向先进典型学习,学习他们开展工作的方法、思路、作风和态度,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拓创新,勇于攻坚克难,增强抓落实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重大政策措施,事关国计民生、事关长远发展。各级务必强化责任担当,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以真抓实干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沈万泉

应该不断扩大教育资源供给面

据媒体报道,日前,由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创办的河仁慈善基金会计划出资100亿元筹建“福耀科技大学”。据了解,拟筹建的“福耀科技大学”性质为新型民办大学办学模式,在办学发展思路上将以“高水平、小规模、应用型、国际化、市场化”的理念兴办理工类科技型大学。

由企业家创办的基金会办学,在国内并不是第一家,此前于2018年成立的西湖大学就是基金会办学模式。不过西湖大学是民办高校,而此次新闻报道中的“福耀科技大学”则属公办大学。到目前为止,我国公办高校还没有采取基金会办学的先例。与私人基金会关系最为密切的公办大学为汕头大学,属于基金会参与建设、资助公办大学办学,而非直接由基金会举办。

基金会办学是发达国家举办学校普遍采取的方式,这种方式可确保办学的公益性,因为所有办学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并用于学校办学开支,举办者不得从办学结余中分红。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如果举办者选择非营利性高校,那么基金会办学方式是最优选择。举办者出资(捐资)、政府扶持拨款、学生学费收入都进入基金会,这种办学模式也有助于学校吸引更多的社会捐赠用于办学。而公办高校采取基金会办学方式办学,即便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私人基金会,也可确定学校的公办属性,政府拨款、基金会出资、学费收入、基金会经营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全部用于办学。

其实,不仅基金会捐资的高校可以采取基金会办学方式,政府投入为主的公办高校也可以采取基金会办学方式——由财政出资建立大学基金会,由基金会举办办学的公益性,因为所有办学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并用于学校办学开支,举办者不得从办学结余中分红。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如果举办者选择非营利性高校,那么基金会办学方式是最优选择。举办者出资(捐资)、政府扶持拨款、学生学费收入都进入基金会,这种办学模式也有助于学校吸引更多的社会捐赠用于办学。而公办高校采取基金会办学方式办学,即便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私人基金会,也可确定学校的公办属性,政府拨款、基金会出资、学费收入、基金会经营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全部用于办学。

由此,河仁慈善基金会与当地政府就基金会办学的公办大学模式,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面的一个重要途径,它的改革探索价值,或远不是增加一所高校所能概括的。

艾萍妍

实现农民增收要打好“三农”组合拳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9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3%。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给农民带来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为开局之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持续用力,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既要稳就业,也要促创业、兴产业,扎实做好农民增收这篇大文章。

来缓解就业压力,才能带动更多人的就业。我国有近2亿的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员,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吸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返乡创业项目来实现农民就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扩大就业“蓄水池”,才能下活农民增收致富“一盘棋”。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帮助下,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牵引,既能推动乡村振兴,也能促进农民增收。据统计,2020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累计达1010万人,1900多万返乡留乡人员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稳就业是前提。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把稳就业和保就业放在第一位,通过政策引导,打出了稳就业的组合拳。春节期间,各地纷纷开展“春风行动”,扎实做好在外务工人员“就地过年”的服务保障工作,做好农民工就地务工意愿摸排,纷纷开出农民工外出务工专列和线上线下农民工就业招聘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总量和收入水平实现双增长,外出务工达1.74亿人,同比增长42.1%,月收入达到4190元。脱贫地区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形势较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促创业是动力。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民就业压力大,城镇就业人员压力也不小,加上每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叠加,全国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通过政策性保障促进就业之外,还要激发广大就业人员的内生动力。通过促进创业

来缓解就业压力,才能带动更多人的就业。我国有近2亿的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员,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吸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返乡创业项目来实现农民就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扩大就业“蓄水池”,才能下活农民增收致富“一盘棋”。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帮助下,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牵引,既能推动乡村振兴,也能促进农民增收。据统计,2020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累计达1010万人,1900多万返乡留乡人员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治理“社会性群殴”切忌高举轻落



查如倩画

线上辱骂、线下人肉、住址被曝光、手机被打爆……近年来,当人们在信息真假难辨的网络空间自由“冲浪”、发言、讨论时,发生在网络空间的“社会性群殴”事件也越来越多。公众拆金,积毁销骨。很多遭受“社会性群殴”的当事人着实无辜。问题出在哪里?

一是部分营销号为攫取流量,对一些尚未证实的消息添油加醋。网络空间信息庞杂,难辨真伪,一些网络账号主体为博取点击量,进而从中攫取利益,不惜炮制未经证实的耸动信

息。二是部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躲在屏幕后面“扔石头”,对当事人进行“网路升堂”。在社交平台的匿名性外衣下,部分网民或出于猎奇心理,或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随意转发、恶语评论,成为“社会性群殴”事件的帮凶。三是囿于溯源难、求证难、手续麻烦、效果不佳等,受害者在被网暴后会选择息事宁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一些人在网络上肆意妄为。

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治理“社会性群殴”切忌高举轻落。目前,多个社交平台对于恶意造谣的账号主体已有禁言、公示等明确的处罚措施。但从十几天到几十天不等的封禁,对于违规主体的震慑力度仍然有待商榷。屡教不改、“换个马甲重新出发”等现象并不鲜见。

治理“社会性群殴”,要做的还有很多。相关部门要推出更多较强操作性和震慑力的处置方式;社交平台应承担起自身责任,对于在禁言期结束后仍屡教不改的账号直接进行封号惩罚,坚决遏制营销号无底线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每位网民都应提升独立判断能力,对未知信源的信息保持理性和清醒,做到“未知真相,不予置评”;受害者也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引导更多人提高法治自觉。

只有多方努力,形成合力和威慑,从源头规避网民被恶意引导,才能彻底根治“社会性群殴”,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所有人远离网暴噩梦。

梁妮

员工受委屈不能只发“委屈奖”

据媒体报道:5月6日,节后上班第一天,重庆美心红酒小镇景区对五一期间服务游客过程中受到委屈的员工颁发了“委屈奖”。其中,索道操作员周先生和保安队长常在获奖名单之列。他们获奖的理由是:在服务过程中受到游客无理谩骂、人身攻击,但他们为了保障现场秩序,真正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近年来,为了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冲突升级,不少城市的服务行业、执法部门等都设立了“委屈奖”。

但这种“牺牲精神”倡导的却是委曲求全,而不是法治精神,它不可能带来公平公正以及合理合理的环境秩序。虽然说人生在世,谁也不免受到委屈,但当员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单位应该帮助员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而不能以发个“委屈奖”了之,否则就是对暴力和违法行为的纵容。所以,当对方使用语言或暴力对员工实施攻击时,不管是否对员工造成身体伤害,都要及时报警,使受委屈员工的自身权益得到法律的及时援助。作为公益诉讼等部门,则应采取法律手段,对施暴者给予行政上的、以至于刑事上的惩处,真正还受委屈员工一个公道。

我们应该承认,对受委屈员工颁发“委屈奖”,确实可以使受委屈员工感受到一种人文关怀,也会带来片刻的风平浪静,但却没能给受委屈者一个实实在在的保障。因为发个“委屈奖”,似乎是在弘扬了“委屈我一个,幸福千万人”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唯此,才能体现出法治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才能有利于社会正气的弘扬和社会正能量的发挥。

袁文良

发展乡村旅游要善做“加减乘除”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策,深入挖掘当地的旅游资源禀赋,培育自己的拳头产品,靠个性化的产品增强自身竞争力。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简单模仿、东施效颦,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做乘法,发挥品牌带动倍数效应,健全乡村旅游产业结构。产品是企业的生命。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没有一个适销对路的品牌,对于弱质的乡村旅游业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品牌,对于行业发展具有乘法倍数效应。乡村旅游业要想实现弯道超车,必须十分注重产品品牌的生产和培育,发挥品牌的龙头作用,保持乡村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是用品牌带动同业发展,形成规模优势,加速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和产业链、价值链构建。乡村旅游由单纯的“看”到“吃喝玩乐住”一体化的多元发展,就是“双链构建”的成果体现。二是用品牌拉动相邻产业发展。近年来多地出现的民宿、观光、采摘等多业态齐头并进势头,就是这种效应的体现。三是靠品牌引领乡村第三产业革命性变革。以市场为导向的细分产业变革引领乡村旅游业无限细分,推动乡村旅游产业迭代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完善。

做除法,找准乡村旅游业的最大公约数,夯实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基础。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十四五”时期,重点是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水平,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用动态的眼光和全域视角,着力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为导向,补齐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全面提升乡村旅游现代服务水平,以科技赋能乡村服务。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等现代科技手段,用技术创新引领服务水平提高,推动乡村旅游业由传统服务行业向现代旅游业的根本转变。周其森

做加法,增加文化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乡村旅游业发展后劲。总的来说,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业文化含量和附加值不高,这是制约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充分认识乡村旅游业的文化属性和以文塑旅的重要性。文化往往是一个行业持久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包括旅游业在内的不少经济类型,本身就是以文化和自然为基本元素的产物。二是深入挖掘乡村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彰显乡村多元文化特色和创新价值。为乡村旅游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文化即人化,人的差异造就了乡村文化的丰富多样。要把地域文化特色凸显出来,形成自己的文旅品牌。尤其要把中国农业文明自成一脉、不断发展的创新精神元素挖掘出来,增强文旅产业文化底蕴,打造乡村旅游产品优势。

做减法,摒弃“两靠”简单思维和产业发展模式,坚持差异化发展方向。乡村旅游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一条简单路径,对其集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简单化利用、同质化竞争问题尤其需要高度关注。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式思维不利于乡村旅游发展;不经过充分调查、论证,比着葫芦画瓢式的同质化竞争,其结果往往是一败涂地。树立科学的乡村旅游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用社会化养老纾解“黏小”症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关于“父母‘黏小’”话题的讨论。所谓“黏小”,是指人过中年的父母开始“反向依赖”,越来越黏着孩子,在情感上、心理上、身体上都依恋孩子,甚至干预孩子择业择偶。

这届年轻人的爱情观变保守了吗

还小,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赡养危机渐渐到来,尤其对“双独”的家庭来说,照料老人的压力更大。此外,不少独生子女面临着父母养老与自身发展的矛盾:长时间漂泊在外,无法在父母身边尽孝,让父母忍受思念儿女的苦;待在父母身边又没有办法更好地发展事业、赚钱养家。于是空巢老人的情感空虚、生活不便,成为离家打拼的独生子女内心难以承受之重;“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小病不愿说,大病瞒着说”,也成为一些

“黏小”症的形成,与当今社会家庭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初步测算,我国独生子女数量近2亿,最早一批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已过半不惑之年,而他们的父母,都已是花甲老人。父母渐老,孩子

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情感,其实也才有100年左右的历史。从五四时期至今,爱情经历了一个降维过程:从一种挑战社会隔离的力量变为如今的一种自我独特性与自我价值的确认,爱情最开始的那种解放诉求已不复存在。这种改变一方面使爱情变得更接近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的“纯粹关系”(无权力等级、平等协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使今天的爱情反而变得更为艰难。

在笔者之前参加的一场关于“985相亲局”的讨论中,有婚恋平台创始人认为学历匹配是爱情的基础,理应将毕业于211高校的会员排除在985高校的会员匹配之外,令人非常不解。

后来,笔者又在一些社交平台发起关于“你觉得婚姻和爱情是一回事吗”的话题征集,在上千条留言和评论中,竟有5/6的评论者认为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甚至有人明确提出婚姻和爱情无关,多数人认为爱情是美好的理想,婚姻则是理性选择的现实。

这倒是与笔者研究团队近年来对年轻人爱情观的追踪研究所发现的趋势大致吻合:年轻人依旧愿意相信爱情的存在,但是却觉得和自己无关,“匹配”成为年轻人在考虑婚姻时的首要因素。笔者并非要对这种理性选择作出价值判断,但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种理性选择与爱情本身所具有的超越理性的激情和超越平庸生活的诉求是不一致的。也由此,有一种声音认为,这届年轻人的爱情观是不是变得保守了?

婚姻排斥爱情的原因,也成为今天人们考虑爱情和婚姻关系的障碍。

在过去的“慢时代”,人们的生活非常稳定,置身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年轻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不得不面对骤增的工作压力和对他人的担忧,这使得他们在私人生活中不再想去挑战这种不确定性,只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来获得安全感。

而选择单身或在婚恋中搞指标量化,看起来正是他们对抗不确定性的方式。选择单身的年轻朋友强调“不婚不育保平安”,并试图通过自我来获得自我的独特性,从而解决自我认同问题。还有一些年轻人则选择通过虚拟恋爱,比如追星、嗑CP(配对)、纸性恋(和二次元中的虚拟人物恋爱)等“快餐”,在避免自我被评价的同时感受恋爱的快乐。

与此同时,仍想进入真实婚恋关系或已经身处婚恋关系中的人,也试图通过一些量化的指标来增加婚恋的确定性。比如相亲时交换彼此的学历、户籍和财

产状况来确保自己未来婚姻生活的质量,恋人间偏好用转账等仪式性的方式来衡量对方的爱等。“感情”或许很不确定,但是这些量化指标是确定的,既然感情无法被保证,那就先保证这些能确定的东西。原本不确定的爱情,就这样被变成一个确定的东西。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并无意批评现在的年轻人婚恋观趋向保守或倒退,而是更倾向于将对确定性条件的选择,视作他们面对现代社会压力的一种应对之举。在这个时代,爱情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它有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很难追求效率,甚至不能用“成败”论英雄。也因此,在今天,爱情越来越成为一个勇敢者的游戏。纵使如此,你依然要尝试去做这样的勇敢者。

沈奕斐